

从《梅花百咏》看日中文学交流

池田温

(东京大学,日本 东京 113-0033)

[摘要]日本锁国时期,并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不仅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入港,而且与琉球(今日本冲绳)和朝鲜保持交往。日本诗人相良玉山草成《梅花百咏》后,寄赠琉球文人程顺则;1713年春程顺则将之传入大陆福州,清朝文人王登瀛特为撰写序文;1714年程顺则奉使日本,将序文交给相良玉山;次年将相良玉山序文刻入诗集出版,从而成就东亚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关键词]清代中日关系;东亚诗文交流;日本汉诗

[中图分类号]I31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5-0021-09

引言

江户时代前期,萨摩藩士相良玉山所著的《梅花百咏》(1715年刊本),算不上是一部有名的汉诗集,作者本人也罕为人知。然而,诗集卷首冠有高岱、伊藤东涯(长胤)、王登瀛等序文,这引起笔者的浓厚兴趣。伊藤东涯是伊藤仁斋的长子,著有《名物六帖》、《制度通》等,是京都堀川的著名儒学家,高岱的名字看似汉人,实是幕府儒官深见玄岱,作为书法家亦颇负盛名;王登瀛是清代福建的文人。当时日本处在锁国时期,请外国人作序恐非易事,因而值得关注。相良玉山是如何获得王登瀛序文的呢?本文拟通过考察这段东亚文化交流的史事,以就教于国内外诸贤。

一、梅花百咏的传统

早春时节,率先开花吐芳的梅花,自古深受日本人喜爱,吟咏梅花的诗歌不胜枚举。《万叶集》中咏梅的和歌达118首,遥遥领先于44首的樱花,古代日本人对梅花之钟爱,超出人们的想像。

奈良时代的天平2年(730)正月十三日,太宰帅大伴旅人在府邸宴请同僚,客主趁兴吟诗作歌,所成《梅花歌》32首录于《万叶集》卷五。兹略举二三如下:“我家池苑里,梅树已飞花,天上飘春雪,纷纷似落霞。”(主人大伴旅人)“梅花今日盛,今盛究何由,只为相思友,簪花插满头。”(筑后守葛井大夫)“万世无穷尽,年年去复来,梅花开不绝,岁岁有花开。”(筑前介佐氏子首)¹此外,《万叶集》(卷十·春杂歌)中收有作者不详的《野游》4首,其一云:“京洛多冠盖,暇时意趣悠。梅花头上插,来此乐同游。”由此可窥万叶人咏梅迎春之喜悦心情。

天平10年(738)七月七日,圣武天皇游幸西池宫,手指殿前梅花,敕右卫士督下道朝臣真备(吉

[收稿日期]2003-05-17

[基金项目]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古代中日书籍之路”(01JA770017)

[作者简介]池田温(1931-),男,日本静冈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法制、敦煌学、东亚文化交流史等研究。

备真备)及诸才子云:“人皆有志,所好不同。朕去春欲玩此树,而未及赏玩,花叶遽落,意甚惜焉。宜各赋春意,咏此梅树。”据《续日本纪》卷十三记载,时有文士30人奉诏献赋。

中国的咏梅诗文,兴于南北朝,盛于宋代以后。其间出现以梅花为主题,一气连咏百首之风气。从唐朝后期至宋代,科举中有以诗赋百篇取士之“百篇科”。在这种背景下,加之梅花深受中国人喜爱,于是士人竞相以梅花为题创作“百咏”。据管见所及,《梅花百咏》的始作俑者是北宋的秦观(字少游,1049—1100年),这部诗集从《古梅》、《早梅》至《十月梅》、《二月梅》,共录七言律诗百首。日本有书林丁子屋仁兵卫刊印的和刻训点本,卷末附有熊谷立闲写于天和元年(1681)的跋记。秦观有40卷的诗文集《淮海集》传世,但《梅花百咏》不在其中,说明当初就是以单行本流播的。在秦观之后,南宋刘克庄(号后村,1187—1269年)作《梅花十绝答石塘二林》二叠至十叠,合计七言律诗百首,收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七。是集系淳祐庚戌(1250)腊月,和林氏兄弟(林同、林合)之梅花绝句而咏。据其跋记,先学李伯玉(端平二年即1235年进士,《宋史》卷四二四有传)亦作过《梅花百咏》。此外,《宋史》卷一六一·艺文志著录《宋初梅花千咏》2卷,可惜早已散佚;张道洽(字泽民,号实斋,开化人,端平二年进士,1205—1268年)作《梅花诗》300余首,现在仅存数首为《瀛奎律髓》采录。

元代咏梅之风愈盛,尤以冯子振(号海粟,依州人,1257—?年)与释明本(中峰禅师,俗姓孙,杭州人,1263—1323年)的唱和最为著闻,经《四库全书》采录而广泛流布。^①韦珪(字德圭,山阴人)的七言绝句《梅花百咏》,有至正五年(1345)十一月会稽杨维禎序(字廉夫,号铁崖,1296—1370年)和天台胡世佐跋,^②日本的和刻本附有文政甲申(1824)正月安积信(良斋)的校订序和吉田乡教(梅庵)的后记。《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载:“玄幼岐嶷……八岁……即知属文。……部使者行县,玄以诸生见,命赋梅花诗,立成十首,晚归,增至百首,见者骇异之。”又元人郭豫亨(号梅岩野人)集古人咏梅句成七律百首,题为《梅花字字香》,至大辛亥(1311)年序,收入《四库全书》、《琳琅秘室丛书》。至明代,传世的有王达善(无锡人,洪武初明经)之《新刊梅花百咏集》^③,以书画鸣世的文征明(1470—1559年)之《梅花百咏》^④,李确(初名天植,字潜夫,平湖人,崇禎举人)之《梅花百咏》^⑤等。此外,康熙五十三年(1714)七月,从王羲之行书中集字而成的《集古梅花诗绝句百首》碑石刻成,现保存在西安碑林^⑥。

以上概观了《梅花百咏》在中国流行的情况,但对明清时代的考察未必充分,还有不少遗漏^⑦。下面我们来看看《梅花百咏》在日本传播的轨迹。

《梅花百咏》从中国传入日本,大概可以上溯到镰仓时代或室町时代,但是笔者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确凿证据。江户时代文运昌盛,日本人吟咏汉诗蔚成风气,诗赋技巧达到很高水平。只要看看秦观和韦珪的《梅花百咏》之翻刻、范成大《梅谱》与《菊谱》合刻^⑧及明人刘雪湖《梅谱》^⑨之和刻本的流通,日本人对梅花及百咏的热衷不容置疑。在这种诗风的强烈影响下,日本人开始自己创作,存世的日本版《梅花百咏》实不下十指(参见表1)。

①《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收冯子振与中峰明本的七绝唱和诗二百首及中峰明本的春字韵七律百首。

②《夷门广牍》辑本,100首中有80余首与中峰禅师的诗作相同,可能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混乱。

③明人左祿辑《新刊牡丹梅花菊花百咏》收录,尊经阁文库存有万历刊本。

④民国刘世璋辑《天尺楼丛钞》收录。

⑤罗振玉辑《明季三孝廉集》收录,附其子李耀《梅花绝句》10首。

⑥见宋联奎编《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十二。

⑦如安积信在韦珪《梅花百咏》和刻本的序中,提到顾霖调的同名诗集,高岱的序中则提到清人莲峰的《梅花百咏》。潘钟的《梅花百咏》附于《百花录注·百花诗》行世,许在璞的《梅花百咏》(《小丁卯集》二卷之中)见《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

⑧文政十三年(1830)巴菽园刊本(阿部栢斋校)其后尚有多种印本。

⑨元禄八年(1695)京都古川氏学梁轩刊本。

表1 日本人撰著的《梅花百咏》及其类书

作者	册数	年代	备考
《梅花百咏》			
小川重胜	1册	元禄15(1702)	稿本
儿玉金鳞	1卷		《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著录
相良玉山	1册	正德5年(1715)刊	
武田栗荫	1册	文久2年(1862)序	
野村圆平(空翠)	1册	嘉永5年(1852)刊	
林茗洞	1册		《名远馆丛书》四十四抄本
	1册		抄本
村冈重德(并连怀纸)	1册	宝历2年(1752)	《加能乡土辞汇》著录
	2册		抄本
	1册		版本
			以上据《国书总目录》
道 熙	1册	贞享4年(1687)刊	
			以上据《新纂禅籍目录》
《梅花百绝》			
川合春川	1册	天明6年(1786)刊	
宫田五溪	1卷		《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著录
	1册		版本
《梅花百律》			
长尾秋水			《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著录
三上 恒(九如)		天保6年(1835)序	谷文晁画
《梅花十咏》			
牧野竹所等	1册	文化3年(1806)版	
			以上据《国书总目录》

通过表1所列的诸书,可以大略看出《梅花百咏》(包括《梅花百绝》、《梅花百律》、《梅花十咏》等类书)在日本流行的情况。宝历2年(1752)值菅原道真850年忌,嘉永5年当其950年忌,这两部诗集的作品显然是为纪念菅公而咏的。除了汉诗之外,题名《梅花百咏》或《梅花百首》的和歌集也相继问世(参见表2)。

表2 《梅花百咏》及《梅花百首》的和歌集

作者	册数	年代	备考
竹内忠良(年名)	1册	嘉永五年(1852)序 元治元年(1864)跋	
北村季文	1册	文政七年(1824)序	抄本
泽庵宗彭			活字本《泽庵和尚全集》(三)收录

天保7年(1836)还刊行过一本书名叫《梅花百人一首宝筐》(1册)的和歌集,配有北尾重政的插图。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与和歌作品相比,汉诗在数量上遥遥领先,这说明“梅花”的主题极大地刺激着汉诗作者的创作欲望,反映出江户时代汉诗创作的空前盛况。

二、相良玉山的《梅花百咏》

相良玉山本名长英,师从萨摩藩的儒士山口治易(性理学家,宝永3年即1706年去世),以“侧用人”仕于藩主岛津吉贵,颇有能吏之才,享保14年去世^①。其著述除《梅花百咏》外,还著有《菊花百咏》。关于《菊花百咏》,伊藤东涯撰于享保8年(1723)的序文存世(《绍述先生文集》卷四),但《国书总目录》等均未著录,大概成书后未及刊印行世,目前连抄本也不知下落。尽管如此,相良玉山之擅长汉诗,从存世的《梅花百咏》1册足可窥探。

《梅花百咏》收作者的咏梅七言绝句100首,卷头冠高岱、伊藤东涯、王登瀛的3篇序文,卷末附刊印者濂尾维贤之跋言,正德乙未(1715)冬由京都书肆奎文馆付梓。本文17页,每半页9行,每行16字。据跋言称,濂尾维贤与萨摩人松岩斋结为金兰之交,本文书法便出自松岩斋之手。兹将卷头《早梅》、《寒梅》2首引载如下:“最爱江南衽影斜,几番惊目兴相加。独怜不厌繁霜雪,待腊先香处士家。”(《早梅》)“野水塘边阴气浓,孤高不避雪霜风。清姿卓立谁同侣,姑射神游寂寞中。”(《寒梅》)从上述两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品所咏的是生长于中国自然中的梅花,梅花之故乡的意象支配着诗人的想像,字里行间透出作者浸淫中国梅诗深矣。我们不妨来看看相良玉山吟咏的全部诗题:

赏梅、观梅、寄梅、苔梅、梦梅、竹梅、郊梅、月梅、忆梅、檐梅、问梅、蟠梅、烟梅、江梅、惜梅、古梅、盆梅、妆梅、魁梅、远梅、友梅、宫梅、巅梅、索梅、雾梅、霁梅、探梅、杏梅、瘦梅、溪梅、野梅、卧梅、瓶梅、折梅、孤梅、落梅、粉梅、剪梅、补梅、咀梅、矮梅、庭梅、浴梅、风梅、寻梅、接梅、簪梅、移梅、小春梅、城头梅、东阁梅、小字梅、胭脂梅、半开梅、未开梅、水竹梅、西湖梅、江上梅、山中梅、茅舍梅、前村梅、孤山梅、水月梅、担头梅、梦折梅、照镜梅、闲居梅、行舟梅、瑶台梅、雪埋梅、月下梅、馨口梅、邻家梅、琴屋梅、汉宫梅、麝舍梅、玉笛梅、纸帐梅、马上梅、画红梅、绿萼梅、杖头梅、乍开梅、书窗梅、争色梅、僧舍梅、酒店梅、道院梅、隔帘梅、林间梅、照水梅、罗浮梅、樵子梅、雨中梅、水墨梅、全开梅、风媒没、干叶梅、菅庙梅。

元人韦珪的七绝体《梅花百咏》的诗题,也是前半2字、后半3字,相良玉山连这些细节都刻意模仿。时间最早的秦观的作品虽为七律,但诗题却与后出的诗集基本相同,17世纪末问世的秦观诗集的和刻本,大概对相良玉山产生过巨大影响。这部诗集只有最后1首《菅庙梅》,是直接吟咏日本梅花的。倘若没有这首作品,人们也许会怀疑此集是否出自日本人之手。诗云:“菅君遗庙在山阳,一树梅花倚短墙。昔日风流情庆重,花神亦未肯相忘。”关于相良玉山的诗风,高岱序称“学宋人刘后村和清人莲峰,别出机杼而一气呵成”,伊藤东涯序评“清新雅澹”;王登瀛则赞“清新俊逸,字字铿锵,墨彬彬乎,有三百篇之逸体焉”。然而,相良玉山并未到过中国,有关中国的知识主要通过书籍获得。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具有多次入华经历的琉球人程顺则的交往,获得许多从书本上得不到的信息,清人王登瀛为诗集寄赠序文,亦仰赖程顺则从中斡旋,而萨摩与琉球的地缘关系,是促成这场文字缘的背景。

三、高岱

《梅花百咏》的3篇序文,高岱序冠前,伊藤东涯序居中,王登瀛序殿后。伊藤东涯序中特别提到王氏的序文,说明在动笔之前看过王登瀛序,但没有言及高岱序。高岱比伊藤东涯年长22岁,其序文内容也最为充实,冠于卷首当之无愧。

^① 参见《鹿儿岛县史》第二卷(1939年刊),第889-890页。

高岱祖父高寿觉(亦作“筹觉”),出生于明代的福建漳州,庆长初年(1596年前后)来到日本,以儒医身份仕于萨摩藩岛津氏,后收镰田新右卫门的次男为养子,取名大诵(但有,1603—1666年),即高岱的父亲。

元和3年(1617)高寿觉携大诵归明,遂病死在故乡。宽永6年(1629)大诵回到长崎,30岁开始仕于萨摩藩,宽永19年(1642)辞去藩职,到长崎任唐通事。翌年娶久富七郎兵卫之女为妻,不久生下高岱。高大诵滞明10余年,精通汉语,在长崎升任大通事后改姓“深见”。高氏郡望在渤海,传闻“深见”含有“深海”之义。

高岱(1648—1722年)名元泰,亦称玄岱,通称新兵卫、新右卫门,字子新、斗胆,号天漪、婺山老人。师承明末渡来华僧独立性易(戴曼公,1596—1672),学儒学、诗赋、书法,同时精通医术。37岁时萨摩岛津光久召为侍读,从而成为萨摩藩士。43岁时因病告退,再回长崎。宝永6年(1709)赴江户,与新井白石邂逅,时已61岁。次经新井白石推举,被幕府擢为“寄合儒者”(类似于学术顾问——译者按)。

正德元年(1711)将军赠给朝鲜国王的《白雉帖》,题辞的撰文和笔书均出自高岱之手。此外,还与新井白石、室鸠巢等奉命接待朝鲜使臣,翌年刊印主客笔谈唱和的《正德和韩集》。高岱与新井白石交厚,曾为《白石诗草》撰序,新井白石60大寿时特寄贺词,并为新井白石撰写的德川家宣的灵庙钟铭挥毫。享保3年(1718)70岁时隐居,其子有邻继任家督。

高岱多才多艺,作为医家著有《养生训》,先于青木昆阳倡导普及甘薯,作为唐风书法家与北岛雪山、佐佐木道荣齐名。虽然论血统是地道的日本人,但他始终意识到父亲作为养子与高氏结下的缘分,特别是师事独立性易禅师而获得丰富的教养,殆乎与中国文人无异。《梅花百咏》的序文用风格独特的草体写成,刊刻时一依原样,尾署汉风姓名“高岱”,捺有“剡谿/第一流”、“高子新”、“婺山/泰帛”3方印章,寓意皆与中国有关,也许他认为如此为汉诗集饰美才显风雅。

高岱与相良玉山同在萨摩藩奉职,两人的交往大概肇始于此。高岱对相良玉山的为人深怀敬意,这在序文中可以看出。关于高岱其人其事,石村喜英氏做过绵密精湛的研究^[2],其生平事迹已为世人所知,本文得益于此甚多。

四、程顺则

清人王登瀛为《梅花百咏》撰写序文,实出于琉球人程顺则的斡旋。伊藤东涯在序文中述其经纬:

岁甲午(1714)琉球使人东来,过都城南,予往观之。其学士程雪堂氏在行中,闻其词翰敏富,尝入中原,游燕市,寓闽藁,与陈元甫、王闾洲诸子相师友。因想一苇航海,历吴会,登天台,恣其耳目,与文儒才子讨论上下,其乐如何哉!而天堑界国,欲往从之,杳不可得,徒增浩叹耳。先有人寄示萨州府官相良玉山氏《梅花百咏》者,盖与程雪堂相识,其诗草因得播中原,王闾洲为之序。这里提到的“学士程雪堂氏”,无疑是指程顺则其人。程氏是琉球的著名文人,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关于程顺则的生平事迹,择要介绍如下^①。

宽文3年(1663)十月出生于琉球久米村,童名思武太,字宠文,号念庵、雪堂,人称名护亲方、名护圣人。其父程泰祚^②从虞氏京阿波根过继给程氏继承家业,其生母系钟氏亲云上宗盛之三女饶古樽。

① 关于程顺则,详见伊波普猷、真镜名安兴著《琉球之五伟人》、真荣田义见著《程顺则传》等。可资参考的基本史料有《程氏家谱》(载《那霸市史》资料篇一之六)。

② 康熙十二年(1673)程泰祚作为进贡都通事入华,晋京途中病没于苏州,葬在胥门外的墓地。参见平和彦《近世琉球国的朝京使节——其贡道与琉球人墓地》(载《南岛——历史与文化》3),1985年版,第211页。

延宝2年(1674)从若秀才擢为通事,历都通事、中议大夫、正议大夫、紫金大夫等,享保4年(1719)至隆勋紫金大夫加衔法司正卿(三司官座敷)。其间,天和3年(康熙二十二,1683)随谢恩副使王明佐赴华,在闽地逗留4年,拜竺天植、陈元甫为师,学习经史和诗赋。元禄元年(1688)琉球唐物问屋(中国商品的批发商——译者注)在京都开张,程顺则自愿主其事。翌年(康熙二十八,1689)选为存留通事再度入华,在中国逗留3年,回国之际购入《十七史》全1592卷。

程顺则先后5次入华,4度晋京,曾在福建刊刻《六谕衍义》、《指南广义》等带回琉球,其中《六谕衍义》从琉球传入日本,由萨摩藩进献给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经荻生徂徕施加训点、室鸟巢译成日文后刊行,作为江户时代庶民教育的课本而广泛流布^①。他编有汉诗集《雪堂纪荣诗》(1693年),著有《雪堂杂俎》(1695年),还在福建刊刻过《雪堂燕游草》(1698年)。

正德4年(1714),程顺则作为将军袭封庆贺的掌翰使初履江户,会见新井白石、荻生徂徕等名流。新井白石撰著《南岛志》、《采览异言》,与程顺则的交谈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从日本回到琉球后,1715年任久米村总役,1718年创建明伦堂,1725年编纂梓行《中山诗文集》,1728年升为名护间切的总地领。享保19年(1734)十二月去世,享年72岁,今墓在那霸市识名。

程顺则参加编纂琉球的外交文书集《历代宝案》第二集,由蔡泽等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编纂的第一集迄于雍正七年(1729),第二集则归纳整理了其后的外交文书。

综上所述,程顺则不仅亲身经历琉球对清、对日的遣使,而且对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期琉球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

琉球接受明清的册封,奉两朝之正朔,向中国派遣的进贡、庆贺、谢恩等使节,明代约350次,清代近120次^②。与此同时,庆长14年(1609)萨摩出兵侵略使之藩属化,翌年岛津家久偕中山王参拜骏府,自此每逢琉球王即位或幕府将军就任,琉球向江户派遣恩谢使或庆贺使遂成恒例。从宽永11年(1634)至嘉永3年(1850),琉球共遣使18次。

正德4年(1714)程顺则作为庆贺使兼恩谢使的成员赴日,前一年恰逢第7代将军德川家继就任,琉球中山王尚敬袭封,程氏不仅顺利完成掌管外交表文的掌翰使大任,而且与新井白石、近卫家熙等众多日本文化人结下文字缘。程顺则先后5次奉使入清,在中国逗留10余年之久,虽然他只到过日本1次,但扮演的角色对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

在正德4年(1714)的琉球使团中,金武王子朝祐任谢恩正使,与那城王子任庆贺正使,成员共180人。一行的日程大略如下:五月二十六日从那霸出发,乘船至萨摩的山川,陆路进入鹿儿岛;九月九日离开鹿儿岛,从久见崎(川内)出航,经大坂抵伏见登岸;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江户,谒见德川家继,完成使命;十二月二十一日告别江户,踏上归途;翌年二月二十一日途经鹿儿岛;三月二十三日返回那霸。全程费时约10个月,是一次长途跋涉的大旅行。

在此之前,程顺则与相良玉山已有尺素往来,此时相良玉山奉命接待琉球使节,从萨摩随伴赴江户,一路上交谊弥深。《萨藩旧记杂录》追录三·岛津吉贵公御谱》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兹引录如次^②:

正德四年九月九日辰刻,吉贵发府城东行,琉球使与那城王子、金武王子(庆贺使与那城,谢恩使金武,从者总百八十人)家老心腹主殿兼柄、若年寄比志岛隼人范房、用人市来次郎左卫门政芬(兼番头)侧用人相良清兵卫长英等扈从之,权僧正智周亦从上京。家老岛津将监久当、侧用人岛津十郎左卫门久置、侧目附平冈八郎太夫之品等护送琉使。吉贵陆取九州,琉使船驾向田(川内)。

① 参见东恩纳宽悛《六谕衍义传》载《东恩纳宽悛全集》卷八)、石井谦《近世日本社会教育史之研究》。

② 原文使用日本式汉语,读来拗口,引录时作了最小限度的改动(译者注)。

十一月七日,吉贵率琉使发伏见,取驿近江、美浓、东海,乃赐琉使驿马二百、担夫一千。……二十六日,吉贵率琉使著东武芝第。二十七日,上使松平纪伊守信庸来樱花第,劳率琉使遥来。二十八日,登营奉谒家继公,献品如先躅。

十二月二日,吉贵率两琉使登营奉谒家继公,著席,琉使勤拜礼。使职献品许多,自亦献数品。……四日,又携琉使登营,琉使奏音乐备台览。毕,赐之金银,飨宴吉贵及两使。……九日,率琉使诣东睿山,使拜礼东照宫。……二十一日,琉使毕事,发东武赴西萨。^①

在上述资料中,相良玉山的名字虽然只出现一次,但可以想像,精通汉诗汉文的他,与琉球使团的“掌翰”程顺则必多接触,旅途中交谊愈深。

十二月四日,程顺则在江户的萨摩藩邸,与来访的新井白石初次见面;正德五年(1715)正月九日,归途中在草津驿停留时,包括两位王子在内的琉球使一行,再度与来访的新井白石交谈。是日,程顺则应摄政近卫家熙之请,作京都鸭川物外楼诗文,获赐摄政自笔《小武当山八景手卷》1轴、款案1张、熏物香合1个。同一天,家熙与大纳言中院通茂通过愿王院权僧正,将玉城朝熏召至岛津家老心腹主殿兼柄的旅舍,令其在扇面书写琉歌献上,作为恩赏摄政赐熏物香合1个、大纳言赐小偶人手匣1个^②。

伊藤东涯与程顺则相遇,推测是正德4年(1714)十一月,琉球使一行赴江户途中。二月二十一日回到鹿儿岛之后,程顺则为萨摩藩绘师木村探元的作品写赞相赠,这是在江户时岛津吉贵通过两位王子拜托之事^③。

一行回国之后,近卫家熙遥请程顺则及乐正玉城朝熏、乐童子滨川(蔡廷仪)3位书法好手馈赠书迹^④。程顺则还向奈良的制墨名家古梅园松井元春赠送题为《古梅园墨赞》的汉诗。程顺则在访日期间吟咏的汉诗中,以下面这首《赋富士山》最得佳誉,一时脍炙人口^⑤：“真是群山祖,扶桑第一尊。满头生白发,镇国护儿孙。”

相良玉山曾将自著的《梅花百咏》赠送给程顺则,程氏对这部诗集颇感兴趣,因而转呈年轻时代入清师从陈元辅时的同门挚友王登瀛,促成了王氏序文飘洋过海的文坛美事。早年程顺则入清晋京的归途,路过高耸于浙江和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吟有如下首《观梅》七律：“玺书高捧上仙霞,曲蹬纡迴路转赊。锁钥千层高插汉,风烟夹道倒飞沙。岭头花待游人赋,雪裹香随使者车。过此仍为闽峤客,不堪闻雁更思家。”^⑥程顺则既能吟如此之诗,对相良玉山的《梅花百咏》产生共鸣,自是性情相类使然的吧。

五、王登瀛与陈元辅

王登瀛寄赠《梅花百咏》的序文,以“康熙甲午岁(1714)仲春望后二日,闽中閩洲王登瀛题于柳轩西深处”结尾,最迟在次年寄至相良玉山之手。序文云:

中山宠文程大夫才华敏懋……五入闽疆,予交最厚。风晨月夕,并辔连床,意气绸缪,千古称足。戊子岁(1708),自以正议大夫奉贡归国,迄今六载,系我萦帙。癸巳冬(1713),邮寄友人玉山清韵诗示予。夫宠文风雅中人,其取友必风雅人也。……予爱之慕之,定知玉山胸次高

①《鹿儿岛县史料·旧记杂录追录三》卷四十九·正德四年条)(日)鹿儿岛县1977年版,第155-179页。

②木村探元的作品是根据程顺则的《雪堂燕游草》绘制的《雪堂燕游图》。此外,程顺则还为木村探元的《中山花木图谱》从“佛桑花”至“榕”共12品,撰写汉文赞辞,作品今存夏威夷大学。参见横山学著《琉球国使节渡来之研究》(日)吉川弘文馆1987年版,第348页。

③参见《琉球聘使记后人所录记》(《宫城书》222)第229页。

④程顺则著《雪堂燕游草》,康熙三十七年(1698)刊,存(日)国会图书馆等。

旷称为玉山,信不诬也。所恨山海各方,莫能一晤。倘天假良缘,把臂言笑,快何如之!书此以为千里之面言。

关于王登瀛的生平事迹,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传记资料,想必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文人^①。但是王登瀛师从的陈元辅,由于弟子程顺则的关系,不少资料保存至今,兹撮要介绍如下。

陈元辅的诗文集《枕山楼文集·诗集》(各1卷),在程顺则的资助下,康熙辛未(1691)壬申(1692)附4序刊刻,卷末的刊记特别申明:“程子捐贖,为予刻诗。”林潭序中也提到:“程子……一日袖昌其(陈元辅字)诗,问予曰:‘此师半生心血也。兹欲寿之梨枣。’”^②

陈元辅的《枕山楼课儿诗话》也是得到程顺则的资助刊刻的,程顺则在该书跋记中写道:“丙子(1696)晋京途中,向陈元辅质作诗疑义,获赐师之《课儿诗话》,遂与僚友杨丹岩、游学诸子毛允和等4人捐资授梓。”^③陈元辅除了参覲元人喇布(1654—1681年)的帷幄及提军张公的幕下外,一生未曾仕官,沉潜于读书与著述。^④他通过与琉球使的交往,对程顺则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著作在琉球人的资助下刊刻,不仅得以名垂青史,而且飘洋过海传播到日本^⑤。

如上所述,日本锁国时期,萨摩藩的一介文士的汉诗集《梅花百咏》,通过琉球人程顺则的斡旋,远播重洋传到大陆的福州,程氏的挚友王登瀛遥寄序文,而成就东亚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在此不由得想起吉川幸次郎的一篇文章,他提到新井白石、室鸠巢、伊藤东涯等16位名士赋诗和清人魏惟度《八居题咏》的史事,指出三流诗人魏惟度因编撰阿谀大官的《皇清百家诗》,日本名士竞相赋诗和之,决非体面之事,实是锁国造成的悲剧。^⑥

16位名士赋诗和魏惟度的《八居题咏》,距《梅花百咏》刊行仅6年。与此相比,本稿所述只是文坛边缘不太引人注目的一段插曲。无名文人之间充满善意的心交,仿佛使我们看到锁国时期文化交流中闪光的侧面。

[参 考 文 献]

- [1] 大伴家持. 万叶集[Z].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2] [日]石村喜英. 深見玄岱の研究[M]. 東京:雄山閣,1973.
 [3] [日]野口铁郎. 中国と琉球[M]. 東京:開明書院,1977.
 [4] [日]宮城郎昌. 琉球使者の江戸上[M]. 東京:第一書房,1982.

[翻译 王勇]

[责任编辑 曾建林]

① 承蒙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胡沧泽先生赐教,知王登瀛有题为《柔远驿草》的诗集。柔远驿在福州东七里的琉球朝贡使驻地,亦称琉球会馆。王登瀛在此与琉球使人频繁接触,《柔远驿草》收录吟咏驿站东西风光的诗作20首,与收录其他诗歌40余首的《柳轩诗草》合刻刊行。这部诗集现存内閣文库,首冠康熙甲戌(1694)林潭序,作品包含送别程顺则归国的五言律诗等。关于《柔远驿草》,请参见陈捷先《清代琉球使在华行程与活动略考》,载《琉中历史关系论文集》,第二届历史关系国际会议实行委员会1989年版,第99~101页。康熙六十年(1721),王登瀛还为程顺则编撰的琉球人汉诗文集《中山诗文集》撰写序文,可见王登瀛是与琉球人交往最为密切的福州文人之一。

② 陈元辅著《枕山楼文集·诗集》各1卷,康熙三十一年(1692)序刊,存(日)内閣文库。

③ 陈元辅著《枕山楼课儿诗话》1卷,雍正三年(1725)跋刊,存内閣文库。另有大湟诗佛校、文政3年(1820)刊等和刻本数种。

④ 陈元辅著《枕山楼课儿诗话》所载福州府儒学司训戴氏序。

⑤ 除了注27的和刻本数种外,其《枕山楼茶略》有日本文政年间(1818~1830)刊本。

⑥ 吉川幸次郎《新井白石与清人魏惟度——日中交涉史的资料一则》,载《东方学》第42期,1961年。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as Seen from 100 Odes to Mume Blossom

Ikeda On

(*Tokyo University , Tokyo 113 - 0033 , Japan*)

Abstract : In the 17th century when it kept its door closed to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 Japan was not totally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Not only did it permit Chinese and Dutch merchant ships to enter the port , but it kept in touch with the Ryukyu Islands and Korea as well. A Japanese poet named Ayira Gyokuzan wrote 100 Odes to Mume Blossom and sent it as a present to Chen Shunze , a scholar of the Ryukyu Islands. In the spring of 1713 , Chen introduced it into Fuzhou , and Wang Dengying , a Chinese scholar in the Qing Dynasty , wrote a preface to it. In 1714 when Chen was sent to Japan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 he gave the preface to Ayira Gyokuzan , who included the preface in his anthology of poems to be published the following year. This has been a much-told story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As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ms , Meihua Baiyong(《梅花百咏》) , or 100 Odes to Mume Blossom(in translation) , features 100 poems on the same topic in 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ms. The content , form , compiling and transmission of this anthology have justified the statement that the “ Book Road ” existed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Chinese poems on mume blossom , which were better know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 were introduced into Japan not long after that , becoming a fashion in the Nara period. Statistics show that Manyosyu contains 118 Japanese poems on mume blossom , surpassing the number of 44 poems on cherry blossom. Ancient Japanese cherished a greater love for mume blossom than one imagined. And apparently , it was the Chinese culture that helped the Japanese cultivate the love.

At the turn of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y , there appeared a fashion of writing 100 poems on mume blossom at one go. The first such poet was Qin Gua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with Liu Kezhuang , Wei Gui , and Wang Dashan and Wen Zhengming following suit in the Southern Song , the Yuan , and the Ming Dynasty respectively. Thus , “ 100 Odes to Mume Blossom ” became a fixed poetic form.

It was in the Kamakura period that this fashion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 in which Japanese took in this novel poetic form through copying , reprinting and translation. It was not until the Edo period that Japanese began to imitate this form ,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100 Odes to Mume Blossom by Ayira Gyokuzan.

Although it was writt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 demonstrating aesthetic awareness , literary interest and rhetorical devic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style , the anthology is , after all , the work done by a Japanese , in which Japanese scenes are depicted and Japanese mentality are revealed. Therefore , it cannot be deemed a Chinese work.

Key words : Sino-Japan rela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 exchanges of poems in East Asia ; Japanese poems written in Chinese